

## 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创办近代企业的

作者：江秀平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

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是两国创办近代企业（或者说近代化）的起点。当时两国的情况如说，中日两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都不是本国资本主义萌芽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来源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开始的，而是从非商品的重工业军需品开始的；不是从私人民营工业开始的，而是从封建官近代机器工业的起步和创办过程，具有许多共同点，然而，时过三十年，其结果是，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殖民地半封建深渊中苦苦挣扎，甚至濒临被瓜分的危机。何以在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竟会产生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是具有复杂内容的问题，它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教育等方面，本文产生和发展方面作些比较分析。我们大致用横向和微观的比较方法，首先对中日两国在创办近代企业中名来比较异同，“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意在寻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挖掘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

—

在两国，最初着手发展的均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军事工业，官办的军事工业，都没有能够发展为资。样，“工业领域一受到刺激，其后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进步会把所有其余的部门也带动起来1页。)。军事工业的创办和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出现了某些带有本质性的变化。其次，航运梁，并与流通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航运业在两国都是紧接着军事工业而着手发展的部门。棉纺织期，两国在这一部门都遭受了来自外国商品的最严重的威胁。而1890年，日本棉纱开始向中国出口，这一型部门。因此，这里就以航运业，棉纺织业为例，来探讨中日两国创办近代企业既相同又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军用工业的发展遇到了缺乏交通能源、资金等方面困难，洋务派从实际以支持军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提出“求富”的口号，企望发展有经济效益的生产事业。但是，洋务题：一个怎样筹得创办近代企业所必需的巨额资金；另一个是如何罗致懂得洋务的人才。当时清政府通办新式企业提供财政力量；而在人才方面，地主阶级知识界有如李鸿章所描述的只知空洞学问，对洋务有鸿章《全书》，朋僚函稿，第13卷，第30页。)。显然只有在官场之外另辟蹊径。如果完全由商人来办，商不归宿，则“久恐争利滋弊”(李鸿章《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29页。)， “非善为倡导，则不能集洋务派官僚便提出“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其目的在于在官府的监督之下，招来社会上的私人资金，

1873年1月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所创的官督商办的近代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的外国航业的嫉妒和反对。每当轮船招商局的轮船在江海行驶时，旗昌、太古等轮船公司便在同一天，同一航线的运价甚至照原价削减五分之四（如上海——宁波线运价由每吨2.5元减为0.5元），企图用跌价竞73年到1877年，在剧烈的竞争中，招商局依靠漕运专利，官款协济和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勉强维持下来运势力在这场倾轧中，也很少利润可图。旗昌轮船公司因在削价中受到亏损，于1877年将各埠码头，仓库给招商局，可见招商局在它创办的初期曾一度同外国轮船公司有过竞争的，这种竞争对外国资本的入侵走拥有的固定资产超过了当时任何一家在华的外国轮船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为从此可以打破外资霸如此，到了1877年，在招商局情况日见好转的条件下，为了避免同外国轮船的竞争，李鸿章就指使唐廷枢“齐价合同”，三家公司按一定比例规定水脚收入，货源分配和轮船吨数，并且议定统一的运费标准，以商局“增减运价”，推行航线，悉受洋商操纵，我国商帮大受运送迂缓，运送奇贵之苦”(《交通史航政：商局的事业受到限制，更为主要的是民族资本的活动因此项垄断合同而受到扼杀和阻止。相反，外资的作份额总是居于优势，因此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高额利润，从而加强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若把1893年各公增加将近2倍；太古增加了4倍；招商局反而减少了(《交通史航政编》第8册，第1064页。)。这表明在20有降，但它的总趋势却是日见减弱的。

日本在1873年11月成立内务省，日本产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日本的海运业就是在这以后发展起来的能自主的情况下，发展海运业不仅有助于收复商权，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代替保护关税的作用；而因此，明治政府主张在殖产兴业期间大力扶植海运业，并根据大久保利通的建议，选了三菱商会作为扶植便汽船会社宣告解散，政府用32万元购买该公司的18艘轮船无偿地拨给了三菱商会、同年九月把委托其管时，政府用150万美元从外国购买的)无偿交给三菱使用。并规定每年向三菱提供25万日元津贴。三菱汽司抗争的问题。它的第一个对手，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自恃资本雄厚，不断降低运费，以图打垮对方。奉陪，经过几番激烈较量，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感到十分棘手，这时日本政府贷款81万元资助三菱汽船会了太平洋邮船公司往返上海航线的船只及陆上设备，并约定以后三十年内不再从事上海航线各港的航运业沿海的航运中撤走。与英国的大海运公司P、O”公司的竞争中，也是以“P、O”公司无条件地撤走而告权取得很大的成效。

比较上述航运业中两国的政策后，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为对抗初期沿海航线上的外国优势，设立了要素，但在下述两点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第一，中国是与外国公司妥协，而且试图与外国公司共同维持司，把外国势力从沿海航线上彻底赶走，第二，中国自始至终维持了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日本则通过抄年后出售官营企业培育资本主义积累了经验。

下面再看两国的棉纺织业。1878年开始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棉纺织厂，也是官督李鸿章向清政府取得了专利，在建厂过程中，织布局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取得了专利、免税的特权。“十设局”。可见，李鸿章的经营方针，除减轻若干税收外，即禁止其它同行业兴办。

几经曲折，织布局于1890年投入生产，到1893年，几次整顿后，渐具规模，布机500台，纱锭达2500页。)。日夜开工布匹产量可达600匹(李鸿章《全书》奏稿卷77，38页。)。不幸十月间，清花间起火，织于纺织业的优厚利润推动洋务派官员急谋恢复织布局，于是华盛纺织总厂于1894年在上海织布局的原址上

上海和宁波等地设立十个分厂。并李鸿章、盛宣怀更进一步制定了垄断纺织业的计划，他们申请总理各国大臣不准续添，俾免壅滞”（李鸿章《全书》奏稿卷78，10页。）。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第一个十年垄断到华盛纺织工业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压抑和阻碍。

在日本，外国棉制品也以开港为契机，侵入日本，国内市场被打开，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是共同的。纺纱给予特别奖励。一方面通过官营模范工厂的示范作用，来推动民营纺纱厂的建立，另一方面内务部于1880年购10套2千锭棉纱机器，然后以无息分10年偿还的条件，出售给有志于兴办棉纺织业的私人资本家。此外，立法，扶植民间资本家（《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第496页。）。在政府的扶持下，在2千锭规模的纱器纺纱厂异军突起，这就是1880年开始筹办，1883年7月正式营业的大阪纺织厂。该厂建立初期拥有25万年则迅速发展为拥有120万日元资本的大企业。以大阪纺的设立和发展为先导，1886—1890年间，日本棉业。这些新企业的资本大多在25万日元以上，纱锭在1万到3万枚之间，从而大大增加了棉纱的产量。据统计从77万贯增长为337万贯（每贯等于3.759公斤）。与1889年的手工粗造棉纱产量（37万贯）相比，占据1贯，并超过了国外进口的棉纱量（米庆余《明治维新》第118—119页，求实出版社。）。到1897年，日本棉资本主义史研究》。第150页。）。这些说明，日本近代棉纺织业确实达到自主的地步。

中日两国的棉纺织业起步时间相近，但中国洋务派官僚想以一两个纺织工厂来堵塞巨漏，抵制洋布而严重压抑和阻碍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发展。而日本，在政府扶持下的机器纺纱厂，一方面排挤了外国棉纺纱厂的经营者大多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原有的棉纺织业的发展无直接的联系。），但它同中国民间经营上受到保护，但始终是作为民间企业受到扶植的，因为有政府的保护而由早期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 二

从以上航运业和棉纺织业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历程处处表明它受到了封建主义可能获得应有的发展。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主要的官督商办企业在封建主义的干扰和资本主义的压迫日本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其前期也是以官营工厂、半官半民工厂为主要形式推进的，它和中国洋务运动中本在后期殖产兴业中实行扶持民间资本出售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的政策。这虽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日本扶植民间资本，出售官营工厂而中国却始终徘徊在官督商办死胡同里，分歧由此为什么说官督商办是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死胡同呢？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官督商办作一些具体分析。

官督商办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物。这种制度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官督商办企业吸收私人资本，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追求利润，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与不计盈亏的官办军用企业相比较，中国近代企业由于封建势力的介入，使企业所受的外部压力有所减弱，但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为重要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既联系又矛盾的复杂情况。代表封建主义利益的官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商这两种不同力量的经营方针和发展前途方面，不可避免会产生尖锐的矛盾。矛盾斗争的结果，总是封建势力凭借政治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

官督商办，对民族资本发展的阻挠和压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企业内部官权侵占商利，束缚发展；在企业外部，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扼制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先从官督商办企业内部来看，首先，官商两种势力，从来就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涉及官商关系的招商局所作的规定：由官总其大可纲，察其利病”（李鸿章：《全书》译署函稿，卷1，40页。），“所有盈余《全书》奏稿，卷20，33页。）。所谓“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含糊笼统，漫无边际，不可能不影响；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权”和“商利”之争。上海织布局首先暴露出这种矛盾。官方代表戴恒、奎寿图和方针问题上长时间里争持不休。在经元善等人的心目中，织布局应该向完全商办的方向发展。他们主张公门的戴恒和奎寿图的异议（经元善《周易初集》卷2，36—37页。）。他们顾虑商股太多，将影响他们在布局不下，经元善因此被迫退出布局，总办局务的郑观应也备受戴、奎等人的排挤。招商局的情况则表现为不李鸿章，遇事必秉承其意志办理”（《报告书》下册，18页。）。形成北洋官僚对招商局事事过问，凡权必位。而封建主义的“官”是以富国强”，最终为了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势必束缚和阻碍企业的经营利

第二，“官”对企业的封建勒索，对企业是一种严重摧残，阻碍了企业的规模和生产经营的扩大。“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一类企业依赖清政府给予优惠，特权密切相关。但是清政府给予的优惠、特权并不为扶持”。“官”对企业的需索是各种各样的。如繁多的报效，命令提供现金捐款、任意动用企业资金等种名目支出的报效“经费”自开办以来计银130余万两（见《股东签注隶部章程》，第4页。），占资本总额它企业所受到的封建勒索也非常严重，如漠沙金砂从1888年到1895年，八年中向清政府提供的各项报效，第4610页。）；电报局从1884—1902年先后向清政府报效达107万余两（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看出，无穷需索，使企业无法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第三，官方权力的扩大与企业的变化。八十年代后，民间资本有了一定积累，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走什么道路的重要时刻，是扶植民族资本呢？还是阻碍民族资本的发展？在这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走上扶助民族资本发展的道路。出于阶级本性，洋务派官僚反而变本加利地对官督商办企业加强了“官督海金融风潮严重地袭击了所有的近代企业。在官督商办的大型企业里，官方乘机对商股采取进一步压抑，中，李鸿章乘机改组招商局，派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为会办，撤去徐润的职务，调唐廷枢北上，专主于月1日。）。表明招商局由托庇于洋务派官僚的买办商人所经营的企业，向官僚直接经营的企业过渡。上海为严重。经元善等维护商股权益的建议，因不符合北洋集团的意图，被排挤出局。1887年，淮系官僚龚易被李鸿章委派为织布局总办（《申报》1888年4月22日。），到了90年代初期的几年中，官款及北洋集团官办止，不计保险局公积金，官款存银已达265000多两（《申报》1893年12月21日。），占织布局资本1/3，因了。八十年代中期后，大型官督商办的经营方针及一座业务几乎都在整顿的名义下全部由商人过渡到北洋上商人不复享有地位，企业的“商办”性质自然也就名存实亡。同时资本情况也以官僚投资，举借洋债作就堵塞了商人投资的渠道，又引进了外国势力，这种变化的实质乃是中国政府的封建统治关系对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丧失了有利的时机。

再从企业外部来看，官督商办，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不能充分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征——发调节作用，阻滞了民族资本的发展。我国民族航运业发展的迟滞是招商局的垄断，特别是它与外国航运上海商人叶应忠申请设立广运轮船局，李鸿章批复不准另树一帜”还没有出世就被扼杀掉了。以致从1871年轮船公司出现。至于棉纺织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在中国手工纺织业解体和洋布输入的刺激下，民族

实很清楚，只有象日本那样，奖励和支持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纺织工业，才能有希望抵制洋纱洋布的倾销，踊跃，由于有上海机器织布局“不准另行设局”的限制，致使1882——1891年十年间除织布局外都没有出同中国清政府对企业的需索无穷和实行垄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对私人资本的大力扶植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往往起主导作用。这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对私人资本进行种种扶植，是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尤其是1881年前后，日本的分离，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转折点。这种大转变之所以出现一方面因为在官办企业中，多数受益甚政上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因为明治十年后兴起的民权运动的压力，使明治政府察觉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而上”道路，就必须向自由民权运动屈服，这对于明治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明治政府所能设民工厂，一手扶植起听命于政府的大资产阶级，成为政府的统治基础。

1881年4月“农商务省”的成立，标志着殖产兴业政策的转变，从以“内务省”时的官办示范劝导改日本明治初期所实施的通过官办企业移植近代产业的政策终止了，此后，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转向了以历史上称之为“官业处理”，日本对官办工矿企业的处理，实际等于或近于将其无偿地奉送给了与政府有关主义工业化的关键环节，经过“官业处理”，受惠的特权私人资本后来大多发展为大财阀垄断资本。日本的实力，促进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是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形成差距的关键一步。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落后国家在起步迈向近代化的境域时，国家政府往往起主导作用，政府既然扶植性质，人力、财力等等，就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了。恰恰在这些方面，中日两国是不一样的。

中国洋务运动时的清政府，是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后的同治中兴政权，是顽固的赤裸裸的封建统治，的基础上的；另外，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者，绞杀了太平天国，其结果更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清朝统治者自己也日益沦为外国侵略者的走狗建主义的压迫下，在缺少独立和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没有直接诞生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集权国家的成立。这作为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近代国家的前提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明治政权虽以生命的对立物建立的，但和中国清王朝镇压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还是不一样的，明治维新利用了反封建斗争中下，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而自由民权运动又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开展政治、经济方面成长的压力，明治政权选择了扶植大资产阶级使其和地主成为统治的阶级基础，从而抑制和另方面也转化为采取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

另外，中日两国当时虽然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并被迫接受了领事裁判权，两国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具体地分析，还是不一样。当时欧美列强，尤其是当时率先侵略亚洲的英国是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洋量白银作为赔款流进外国侵略者的库藏。中国的条约是打败战而订的。比较而言，日本还不是西方列强间矛盾以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牵制，还来不及对日本大动干戈”，日本明治政权没有经历过对外彻底日本在1866年的《江户条约》中关税改为和中国一样的5%，但在中国，总税务司由外国人担任，各个海税如同虚设，连百分之五的关税也不能保证。可见，条约对两国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清政府的半殖民地还想利用日本作为他们在远东的前哨阵地，因而采取了支持日本维新势力的政策，这些都是日本明治维总之，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创办近代企业的过